

# 东亚经济一体化的困境与出路

陈廷根

(广东商学院 广州 510320)

[关键词] 东亚; 经济一体化; 困境; 出路

[摘要] 区域经济合作的迅猛发展, 促使东亚经济走上了一体化的快速发展道路。但是由于历史和现实原因, 东亚经济一体化进程面临着多重制约因素。加快推进东亚经济一体化应增强东亚意识, 完善发展模式, 提倡大国合作和建立有效的运行机制。

[中图分类号] F114.4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6099(2012)02-0081-05

## A Study of the Constraints and Solutions of Economic Integration in East Asia

Chen Tinggen

(Guangdong University of Business Studies, Guangzhou 510320, China)

**Keywords:** East Asia; Economic Integration; Constraint; Solution

**Abstract:**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regional economic cooperation has enabled the economic integration in East Asia to take on a fast track. On the other hand, it has also been constrained with a number of factors due to the historical and realistic reasons. In order to push forward the economic integration in East Asia, emphasis should be placed on the strengthening of East Asian awareness, the perfecting of development model and the advocating of cooperation between great powers.

由于欧元区主权债务危机的发生, 曾一度备受世人看好、地区整合程度最高的欧洲一体化面临重大考验。而在东亚地区, 美国与俄罗斯如期参加 2011 年的“东亚峰会”, “10+8 峰会”机制正式开始运作。与困难重重的欧盟相比, 东亚集合了众多充满活力的新兴工业化国家的东亚经济一体化进程再次受到世人前所未有的关注。

随着世界经济相互依赖程度的日益加深, 经济全球化的迅猛发展, 特别是 1997 年东南亚金融危机爆发后, 东亚各国和地区深深感受到, 只有加强相互间的经济合作, 走区域一体化发展的道路, 才是增强抵抗金融风险能力、提高东亚经济整体水平的唯一战略选择。自此以后, 东亚经济合作的步伐明显加快。但是, 由于东亚本身的特殊性, 经济合作和一体化进程又受到诸多因素的制约, 要建成真正意义的区域性经济一体化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 一 目前东亚经济一体化进程缓慢的原因

欧盟能够发挥积极作用, 关键在于其坚定不移地执行了一系列经济合作政策, 以此加速推进了欧洲地区一体化进程。相比之下, 在东亚经济一体化进程中, 尽管各国和地区间的经济交往日益密切, 取得了巨大成就, 并成为当今世界经济与贸易最为活跃的地区之一, 但是, 这些成就的取得主要是在自发性市场力量的驱动下进行的, 缺乏有效的制度驱动, 导致一体化进程一直处于相对松散的经济合作组织状态, 这是东亚经济一体化进程缓慢的重要原因。北京大学张锡镇教授认为, 虽然各方都有合作的动机, 但东亚合作仍面临着国家间相互信赖程度很低、强盛的民族主义反对出让民族利益、美国的消极影响以及缺乏地区性核心大国的推动与主导等不利因素的阻碍<sup>[1]</sup>。可见, 相互间政治意识形态差异大、经济发展模式缺陷多、美国牵制作用

[收稿日期] 2012-03-20

[作者简介] 陈廷根, 广东商学院研究员。

强、核心大国未起领导作用和中日关系不稳定是东亚经济一体化进程缓慢的五个主要原因。

(一) 东亚各国政治意识形态差异大, 合作愿望不强烈

从政治制度看, 东亚地区除中国大陆、越南和朝鲜实行社会主义制度外, 其它国家和地区都实行资本主义制度。同时, 东亚地区在民族、语言、文化、宗教信仰等意识形态方面差异很大。这是其它区域一体化组织所没有的特征。当然这些差异性不一定会直接影响到一体化的成败, 但是在国际政治关系日益经济化、经济关系日益政治化的今天, 政治因素有时是决定经济合作的重要方面, 任何国家间的经济合作和由此形成的经济关系都必须服从于各国的对外战略总目标。由于东亚各国参与东亚经济一体化的动机不同, 所以各国对推进东亚一体化进程速度的认识和所采取的措施也不尽相同。例如东盟各国对建设东盟自由贸易区、东盟和中国对建立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看法不同就直接影响到各种自由贸易区的启动和进程速度。中国、东盟国家和日本对建立东亚自由贸易区的看法和认识也不同, 中国、东盟希望建立只有东亚国家参与的东亚自由贸易区, 主张把范围限定在东南亚和东北亚诸国, 条件成熟时可吸收朝鲜、蒙古参加; 而日本则倾向于把范围扩大到东亚以外的澳大利亚和新西兰, 甚至是印度等国, 以建立一个以日本为中心、由日本领导的“大东亚经济圈”。而美国从自身利益出发一心想主导东亚事务, 所以一直在或明或暗地反对没有美国参与的东亚一体化。由于东亚各国对建立东亚经济一体化的认识和出发点不一, 这种“同床异梦”造成了各国既想追求利益的最大化但合作愿望又不强烈的局面, 致使一体化进程缓慢。

(二) 东亚各国(地区) 经济模式缺陷多, 发展水平不均衡

东亚各国和地区经济发展水平极不平衡, 表现为层级上的明显差异: 东亚第一层级是经济最发达的日本, 不论是经济总量还是人均 GDP 都属于当今世界最高国家之列, 其中 2011 日本的经济总量达到 5.5035 万亿美元, 人均 GDP 为 42820 美元, 增加到了历史最高值; 第二层级是新兴的工业化国家或地区新加坡、韩国、中国台湾和香港地区, 曾被称为亚洲“四小龙”, 创造了东亚经济发展的“东亚模式”, 人均 GDP 达 1 万美元以上, 2011 年人均 GDP 更是超过 2 万美元, 分别为 43117 美元、20591 美元、20139 美元和 31591 美元; 第三层级是中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菲律宾等国, 自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 经济发展迅速, 经济总量增

加较快, 但人均产值仍较低, 其中 2011 年人均 GDP 分别只有 4382 美元、8423 美元、3549 美元和 2007 美元; 第四层级是老挝、越南、柬埔寨、缅甸等, 属于特别贫困的国家, 人均 GDP 只有 1000 美元或更低<sup>[2]</sup>。这种经济发展水平的不均衡性是由于东亚地区产业结构的国际分工造成的。作为经济强国的日本在其中发挥了不可或缺的作用。特别是 20 世纪 70、80 年代, 日本依据东亚国家或地区经济、科技发展水平的差异性, 有针对性地进行本区域的国际劳动分工、技术转让和资本转移, 促进了东亚各国或地区的经济发展, 也被学界尤其东亚学者所普遍接受, 这种经济发展模式叫“东亚模式”, 又叫“雁行模式”。在这一模式引导下, 处于第二、三层级的国家或地区(或称“雁翼”和“雁尾”) 大量吸纳日本(或称“雁首”) 的技术和资金, 接受日本的产业转移, 以后发优势发展外向型经济, 促进各自经济的快速发展。然而, 这种发展模式也使后进国家或地区的产业结构趋于类同, 依赖性增强, 一旦外部环境发生变化, 其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将难以为继。东南亚金融危机的爆发就证明了这种垂直型为主的国际分工格局已不再适应东亚经济发展的需要。加强相互间的合作, 共同探讨适合东亚经济的发展模式、提高经济发展的整体水平就成为必然趋势。

(三) 美国势力牵制, 消极影响趋强

美国虽然远离东亚, 但作为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 从其“领导全球”的战略出发, 它认为自身在东亚拥有巨大的政治、经济、安全等方面的战略利益, 不愿看到一个可与之竞争的东亚经济联合体的出现, 因此总是向东亚各国和地区施加压力, 阻挠东亚一体化进程。例如, 1990 年东盟国家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穆罕默德提议成立一个由日本发挥领导作用的排他性的“东亚经济集团”, 由于遭到美国的严厉抨击而使这一设想化为泡影; 1997 年日本提出成立一个筹资 1000 亿美元的“亚洲货币基金”构想, 也遭到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和国际组织的反对和制止。美国在日本、韩国建立军事基地长期驻兵, 名义上是为了保护日韩安全, 其实是为了主导东亚事务, 从中获取更大的政治、经济和安全利益。虽然小布什主政时期由于“9·11 事件”和伊拉克战争、阿富汗战争无暇顾及东亚事务, 但是奥巴马上台以来不断寻求在东亚地区重建更为强大的影响力, 特别是 2011 年美国政要频繁访问东亚有关国家, 多次在相关会议和场合高调重提“重返亚洲”。美国一直以来都利用东盟来制衡中国, 在南海主权问题上就利用中国和东

盟一些国家的争端达到离间双方关系之目的,从而牵制和压制中国。总之,“美国对一个有凝聚力的亚洲贸易集团没有兴趣,分而治之才是真正重要的”<sup>[3]</sup>。

虽然东亚各国经济贸易与投资往来日趋密切与频繁,但并没有摆脱对美国市场的依赖。2008年以来美国作为仅次于中国的日本最大出口市场的地位一直未变。东亚其它国家和地区的经济不仅依赖于美国市场,也依赖于日本市场。有些国家或地区对美日出口占其出口总额的比重甚至超过80%。近年来由于受到金融危机和欧债主权危机的影响以及美日自身原因致使经济下滑,贸易保护主义抬头,这都直接影响到东亚经济一体化的进程。同时,由于日本、中国和东盟每年都有相当数量的对美贸易顺差,在考虑加快经济一体化进程上也就不能不慎重考虑美国的态度和立场。这种“依赖性”和“脆弱性”决定了东亚经济一体化在一定时期内难以摆脱美国势力的影响。

#### (四) 东亚大国功能未发挥,核心作用无体现

从欧盟和北美经济一体化的实践不难看出,任何一个区域性一体化组织都无一例外地需要核心力量的存在。“法德轴心”是牵引欧洲一体化的火车头,美国在北美经济一体化中担当了核心力量的角色。从“综合国力论”来说,要在区域一体化组织中成为核心大国,其政治、经济、科技、国防、文教、外交和资源等要素所构成的综合实力必须强大,而且与其它国家相比相差悬殊,并且是众多成员国中公认的大国。核心国家的职能在于协调成员国利益、稳定区域内部的合作成果,推动组织功能更加有效地发挥。但是,在区域合作组织中,核心大国至少要有两个以上,而且必须相互理解和精诚合作,甚至要放弃一些既得的国家利益。当然,如果区域合作中只有一个核心国家,要保证这一区域的合作能够顺利进行,那么,这个核心国家必须实力雄厚,国内市场广阔,能为成员国提供安全保障,而且在政治上是一个负责任的大国,才能担当和履行作为区域合作的组织者和领导者的重任。

就目前的东亚经济一体化来说,只有中国和日本勉强具备担当核心国家的基本条件,但中日两国由于历史和现实的种种原因,尚缺乏愿意承担核心国家的义务和发挥核心功能作用的精神,相互间隔阂深,信任度也低,而其它国家由于实力限制不可能成为核心国家或核心集团,这就降低了东亚各国或地区间的凝聚力。例如,在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中,东亚内部缺乏核心力量及共同应对危机的机制的弊端暴露无遗。东盟各国和日韩出于自身利

益的考虑,大难当头自顾自地竞相贬值本国货币而不顾东亚整体利益的行为,直接导致了危机在东亚的迅速蔓延,加剧了危机的危害程度,使东亚各国或地区损失惨重。与之相反,中国在这次金融危机中,为了东亚的整体利益坚持人民币不贬值,而且在力所能及范围内支持东亚各国或地区摆脱危机,树立了负责任的大国形象。

其实,东亚经济一体化少不了中日作为核心国家的主导作用。中国实施和平发展战略对中日两国来说本来应是“双赢”的过程,是相互促进而不是相互冲突,也有利于东亚经济一体化的深度发展。但是,由于历史和现实原因,中日之间的政治经济矛盾导致中日双方合作基础减弱,相互间“缺乏互相信任的基础”<sup>[4]</sup>。中日在地理上是近邻,经济相互依存,两国的GDP总量占了东亚的84.5%。很显然,日本是东亚最大的投资国,中国是东亚最大的市场,东亚经济一体化应当以中、日两国为核心。如果中日双方不进行真诚合作,其后果就是资源无法有效配置,市场不能合理划分,更不用说推动东亚一体化的发展了。中日建立稳定的政治关系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令人遗憾的是,一系列政治问题导致双方互不信任。只要日本对历史问题、台湾问题以及钓鱼岛主权问题没有正确的认识和态度,中日关系就不可能取得实质性的进展,双边合作的基础也就相当脆弱。在欧洲经济一体化进程中,德国、意大利由于妥善处理了历史问题,得到国际社会的欢迎,最终融入欧洲一体化而获得了新的发展空间。而同样作为二战战败国的日本既不能正视历史,深刻反省自身,又甘心充当美国遏制中国崛起的急先锋,这本身就是阻挡了东亚经济一体化的行为<sup>[5]</sup>。由于日本忽略中国综合实力的影响而想独揽东亚经济一体化的主导权和领导权,不与中国合作,因而在东亚经济合作制度和运行机制建设上就显得举步维艰,也导致一体化进程大打折扣。

#### (五) 中日关系变数大,政治基础不牢固

为了尽快实现东亚经济一体化,东亚各国和地区从不同角度表达了加强经济合作的愿望,甚至还提出了包括建立东亚共同体和发行共同货币的具体进程方案。但是,由于历史和现实原因形成的错综复杂的内部矛盾,致使东亚各国相互间的信任度不断降低,合作的政治基础大打折扣,这是影响一体化进程的深层次原因。这种深层次的原因主要是由日本因素造成的。东亚各国和地区曾深受日本侵略之害,但日本至今仍不能真正反省和道歉,并有意修改战后的“和平宪法”,加快谋求政治军事大国

的步伐。近年来,日本多位首相多次参拜靖国神社的行为无疑给东亚其它国家与日本的正常关系蒙上了一层阴影。日本前外相麻生太郎在2006年2月19日NHK的电视节目中,针对当时无法举行中日、日韩首脑会谈的状况就公开说“要有一定的思想准备,不要期待与邻国一直保持良好关系是不是更好?”,并表示日本与中韩关系今后很难出现根本性的改善。2011年日本新任首相野田佳彦上任后的亚洲外交令东亚国家感到不安。他在政治上秉承了“松下政经塾”的强硬风格,是民主党内鹰派人物的著名代表;在领土问题上他对华态度强硬,增加了中日关系的不确定性。在2011年8月15日“终战纪念日”,野田佳彦又重申了“被称作甲级战犯的人并非战争罪人”的立场,招致了韩国等亚洲国家的强烈不满与抗议。野田佳彦还曾表示“中方可能会为煽动民族主义搞一些小动作。日本必须严密戒备,以防紧急事件发生。”可见,尽管日本在东亚经济发展中起到过“领头羊”的作用,但由于其对待历史的错误言论和做法明显地引起东亚各国的不信任,日本不但没有真正发挥“核心大国”的作用,反而在一体化进程中起到了消极作用。暨南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曹云华教授就一针见血地指出,中日关系是一对“缺少信任基础的伙伴”<sup>[6]</sup>。北京大学张锡镇教授认为,“中日之间的不谅解与不合作造成了东亚地区合作中核心国家主导作用的严重缺失,这就是东亚地区一体化进展如此艰难的症结所在。”<sup>[7]</sup>

## 二 多种措施加快推进东亚经济一体化

针对以上的制约因素,如何采取有效措施走出困境,加快东亚经济一体化进程呢?笔者认为,加快推动东亚经济一体化,应以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为实践核心,以建立次区域的自由贸易区为初期目标,将东盟自由贸易区和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作为东亚自由贸易区的基本框架,沿着“10+3”、“10+1”机制向真正意义的一体化过渡。具体来说,包括这几个方面:

(一) 增强“东亚意识”,提高东亚认同感、责任感和归宿感,推动一体化的深度和广度

要在东亚这样一个政治社会制度不尽相同、产业结构和经济发展水平不一的地区形成一个制度完整的真正意义的区域性经济一体化组织实属不易。但如不形成具有整体经济力量强大的区域组织,东亚又怎样才能在快速发展的世界经济一体化进程中发挥应有的作用?所以首要的事情就是增强“东

亚意识”。“东亚意识”是一种强烈的“我群意识”,强调东亚各国或地区经济发展方向和目标上的一致性,强调合作,强调协调,强调共同利益,也就是说,东亚各国或地区都必须强调自己是东亚经济一体化中的一员,是一种区域主义。实际上,这一意识已经表现在东亚与西方国家所强调的人权观的强烈不同上,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后在经济方面也有较强表现,正因如此,在很大程度上才有后来“10+1”和“10+3”的出现。但是“东亚意识”不是狭隘的区域主义,“10+1”、“10+3”机制强调的是“开放的区域主义”原则,是“东亚意识”的一个全面反映。但这一意识在东亚各国或地区中还未完全深入人心,这就要进一步增强“东亚意识”,减少摩擦,降低内耗,求同存异,提高认同感、责任感和归宿感,不断推动东亚经济合作和一体化的深度和广度,不要使东亚经济一体化处在世界经济区域化进程中的落后位置<sup>[8]</sup>。

(二) 完善发展模式,调整产业结构,构建比较优势,加快协调发展

东南亚金融危机爆发的原因之一就是曾经创造过东亚经济发展奇迹的“东亚模式(雁行模式)”缺陷多,产业结构不合理。一旦这些缺陷的某个方面出现问题,就会造成制度性的缺失,比如金融风险的阻挡力量就显得单薄,从而一发而不可收拾,危机的爆发不可避免。当前乃至今后一定时期世界经济发展态势已使东亚国家或地区的那种靠大规模生产和出口劳动密集型、资源消耗型产品来促进经济发展的模式不再具备促进经济持续发展的最大优势。所以,在东亚经济一体化进程中,东亚各国必须依据当今世界经济发展走势和本国本地区实际,发挥资源禀赋优势,构建比较优势,不断完善发展模式,调整产业结构,实现从传统的劳动密集型经济向现代知识密集型经济转变,从资源消耗型经济向高科技密集型经济转变,从外向型经济为主向外向型、内需型经济相结合的发展模式转变,这是东亚各国或地区谋求经济一体化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

(三) 互信协调,联合自强,逐步建成强劲的“东亚集团”

目前阻碍东亚各国间建立信任关系的因素主要有两个:一是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包括领土领海争端的解决和日本对侵略战争的正确认识问题;二是各国在地区内综合实力排名中所处地位的不同造成的现实心理问题。这些因素使东亚成员间的互信度存在一定的脆弱性,不利于东亚经济一体化的发展。其实自由贸易区作为国际社会较为普遍接受的

一种区域一体化形式,符合当今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发展趋势,也是适合东亚经济一体化发展的。而现有的“10+1”、“10+3”机制,特别是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立,正在为东亚经济一体化的协调机制、合作框架等诸方面奠定基础,为建立东亚经济一体化的初始目标——自由贸易区提供了一些切实可行的经验与做法。要共同打造在世界经济一体化发展中具有强劲竞争力的“东亚集团”<sup>[9]</sup>,东亚各国或地区仍需共同努力,加强互信,平等协商,联合自强。

#### (四) 加快制度化建设,创建高效的合作运行机制

区域性国际合作机制是国家间开展国际合作的动力和条件。随着东亚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启动,逐渐建立起一套完整的为各成员国接受的合作运行机制,是一种必然的选择。东亚各国或地区目前普遍认同并取得初步成效的合作机制被称为“10+3”机制,它包括东盟10国加中日韩3国的定期首脑会议、东盟与这3国分别召开的首脑会议、中日韩3国合作、东亚13国的各种部长级会议、湄公河和东北亚次区域的多边合作安排以及第二轨道的活动。东亚合作机制的建立为东亚国家提供了一个开展合作的平台。东亚合作的日益深化促进了东亚合作机制的逐渐完善和提升,必将促进东亚经济一体化的纵深发展。

为创造符合东亚实际的高效运作的东亚经济一体化运行机制,在加快制度化建设过程中,应体现出以下七个方面的内容:一是“东亚特色”。“10+1”、“10+3”机制是由东亚国家自行建立的合作机制,其成员国仅限于东亚国家,目标是为逐步建成真正意义的东亚经济一体化做准备。二是“政府推动”。要以各国政府为主导先在各国政府间建构具有法律效应的官方合作大框架,之后再通过民间跟进方式推动合作项目的完成。三是“东

盟主导”。无论从酝酿到倡议,从建立平台到向前推进,东盟国家都起着主导的作用,所以东亚合作机制称为“10+3”等。四是“纵横交错”。目前的东亚合作机制是一个自上而下的纵向联系和各个领域的横向协作的综合体。从纵向看有国家首脑会议、部长级会议、司局长会议和第二轨道等机制,从横向看则有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安全等多领域的合作机制。五是“多层安排”。东亚合作存在着多层次的合作安排,包括小区域合作计划,如湄公河次区域合作、图门江流域合作开发;次区域合作圈,如东北亚次区域合作和东盟自由贸易区;东盟分别与中日韩的合作安排等。六是“过程动态”。从“10+1”、“10+3”到现在的“东亚峰会”确定将建立“东亚共同体”作为长期努力目标,这一合作过程本身就是一个动态的过程<sup>[10]</sup>。七是“中日协调”。中日两国作为东亚地区事实上的核心大国,应该妥善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增强互信,发挥大国作用,履行大国义务,协调好东亚经济一体化进程中的重要问题。总之,东亚合作机制从经济合作入手,以贸易、投资和金融合作为重点,向着政治、安全、文化等领域拓展,逐渐形成多层次、多样化和多渠道的全方位合作的态势,为实现东亚区域合作、向真正意义的一体化目标迈进提供保障和平台。尽管目前还存在着机制相对松散、体制尚不够健全等问题,但随着东亚区域合作的日益深化,这些机制将不断完善和提升,从而更加有力地促进区域一体化进程向前发展。

可以预见,随着东亚经济一体化进程的深入,东亚自由贸易区的建成,现有的“10+1”和“10+3”机制也将经历一个不断修正和完善的过程,只有高效的运行机制才能为实现真正意义的一体化起保障作用。因此,东亚经济一体化的机制建设是一项长期的系统工程,需要东亚各国的共同努力。

#### 【注 释】

[1] 潘国华、张锡镇主编《东亚地区合作与合作机制》,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年。

[2] 东亚国家或地区2011年经济总量和人均GDP数据是根据中华网论坛《2011年世界各国GDP及人均GDP排名》及相关资料统计汇总而成。

[3] 〈美〉L·瑟罗著,周晓钟译《资本主义的未来:当今各种经济力量如何塑造未来世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

[4] 曹云华《探究亚太新秩序》,世界知识出版社,2002年。

[5] 吕宏程、王维贞《中日政经矛盾对东亚经济一体

化的影响》,《浙江金融》2004年第3期。

[6] 曹云华《探究亚太新秩序》,世界知识出版社,2002年版。

[7] 张锡镇《东亚地区一体化中的中—日—东盟三角关系之互动》,《东南亚研究》2003年第5期。

[8] 陈松川《东亚地区经济一体化的目标与模式》,《亚太经济》2001年第4期。

[9] 同[8]。

[10] 苏浩《东亚区域合作的机制化安排》,《外交学院学报》2004年第4期。

【责任编辑: 邓仕超】